

张氏先祖迁徙至会宁以后，经过明朝中后期及清初，特别是“康乾盛世”共约 400 多年的休养生息和艰辛创业，到乾隆时期，也就是张氏 22 世张万仓父前后，张氏家族的家室、家业达到张氏家史上最为兴盛之时。

一是房屋、田产逐渐扩大。到“康乾盛世”之时，张氏在大岔湾、小塬子、扯家川、孔家庄子等处已有多处院落与住房，其中大岔湾及扯家川两处住宅较佳，房屋为砖木结构，砖墙瓦顶，在当时当地当属上乘。在大岔湾、小塬子、扯家川各有耕地约 1200 亩，孔家庄子有耕地 800 多亩，4 处合计已有耕地 4000 多亩，还有马车和数量较多的骡马牛羊，家产扩大，家业殷实，经济实力较强，成为当时当地主要的种田和纳粮大户之一。

二是社会地位提升。在明清时期常为有功德、有影响的人或事“树碑立传”，所立碑石（碑文）大致分为墓碑、功德碑（亦称路碑）和记事碑三类。张氏家族在清朝中后期所立之碑主要是功德碑与墓碑。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仍然存留，其上刻有文字的碑石共计 6 块，大岔湾、小塬子、扯家川各有功德碑 1 座，其式样基本类似，底座高约 80 公分，主碑宽 1

米多，高 2 米多，两侧有侧碑，顶部有石雕碑头，建造精致。

大岔湾的 1 座功德碑，为张万仓父亲所立，叙述他的业绩与功德，建于清乾隆年间，因碑石全毁，具体内容已无从考证。

小塬子有碑石 4 座，一为张万仓功德碑，其余 3 座是张万仓父、张万仓、张进珍墓碑。碑文内容主要涉及三代人勤俭创业、孝敬老人、崇文尚武、乐善好施等，族人中已有太学生、文秀才、习武者。其中张万仓父与张万仓两人的碑文，为皇清“例授”、“恩荣”，似乎系官府或乡邻倡导所建。

扯家川功德碑 1 座，为张继勘所建，建于咸丰六年。因碑石遭毁，正面碑文已无法看到，但据记忆，其中有“先有大岔湾、后治扯家川、复治小塬子……”等语，主要记述的也是家业、家世、接济乡民及有关善事、善举等。碑石背面碑文中残留可辨的尚不到 30 个字，所记为 25 世继勘之妻姜孺人扶幼子（原）持家、亲督农耕、振兴家业之事。经自敬校补之后的具体内容为：“时年张门姜孺人，针灯暮劳至夜，又因儿原尚幼，每早大岔小塬而日暮至川，亲督农耕，历数载，又次业传于子，时家业兴旺，人祥咏

谐。”从简短碑文可见，即便张门孺人都能如此敬业，为世人称道，可见家风的勤勉与敬业。

在当时，不论是官府、乡民或自家，能够树碑立传的人家实属不多，张氏有多处功德碑与墓碑，应是家境状况较为殷实、德高望重或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反映。

2016年8月在自敬、自新、自良、自和等的一次交谈中，自良说：会宁县志办张克靖称：据他所知，会宁北半县立有碑子的，除了郭城驿万家，再就是扯家川张家。（关于碑石及碑文内容详见《张氏功德碑、墓碑等资料收集整理》）。

以上碑石虽在“文革”期间不同程度被毁，但残块的收集和碑文内容整理，也为了解家史提供了最可靠的实物依据。

另外，据有文字记载和老人代代传言，康乾盛世后，张氏家族人丁兴旺，在22世张万仓父之后裔中，除26世鹏蕃（即上述4地居住者）之外，根据自仁讲述（学库整理），在周边另有三支，即中滩张印福为一支（29代），白草塬塬边社张印元一支（29代，张印元家在解放前家境较佳，在白草塬窟沱村中庄社留存有堡子），白草塬窟沱村中庄社张发将

一支（张发将与我家 **29** 代同辈，张发将的上一辈是张世杰、世雄、世英、世让，张安邦等，这族人丁兴旺，现人口较多）。还据先祖口传甘肃省古浪县的大靖、土门子也有张氏后裔居住。

清末及民国时张氏家族在磨难中前行

到清朝晚期，朝廷日趋腐败，民族纷争不断，匪患猖獗，民不聊生。据记载，会宁一带，由于同治年间的纷争、战乱与灾荒，全县人口由 **21.8** 万人锐减到光绪 **30** 年（**1904** 年）的 **4.8** 万人。

张氏家族也深受其害。

十八兄弟多人遇难。据传，同治年间张氏 **26** 世先祖共有亲堂弟兄 **18** 人，因匪乱、灾荒等大部死于非命。其中如小塬子大庄子门前的三墓为亲兄弟 **3** 人，其中 **2** 人被土匪窜入院内所杀，抛尸水缸中，另一人在院外解手，逃走后再无音信，只有补留坟冢。扯家川坡地下边埋葬的是 **18** 兄弟中，张鹏蕃亲弟兄四人中的老大和老四，只有老二鹏蕃和老三鹏涛是两位幸存者，其余 **16** 人都在反乱中惨遭不幸或下落不明。当时多处住房被拆烧抢掠，一度无栖身之地，曾经去中滩临时栖居，多处农田荒芜，杂草丛生，生计艰难。

重振家业。劫难之后，十八兄弟中的幸存者鹏涛、鹏蕃继振家业，而鹏涛又较早去世，鹏蕃及其二子（即 27 世守先、耀先）又担起了继续振兴家业的重担。

白草塬孔家庄子的接续。关于“孔家庄子”，据张氏几位年长者（自仁、自良等）讲，听前辈们说，因原住该庄子的张氏先祖约在同治二年（1864 年）前后，由于乱世无法生存，便逃往“巩昌府”，即现在的陇西，因庄子的主人逃往巩昌府，故时人称“巩昌庄子”，后来渐渐演绎为“孔家庄子”。据考，该庄子建于咸丰末年至同治初年（大约 1862 年前后），也是张氏先祖所建（但非张万仓后裔），庄廓建成后，院内房屋未来得及修建，便于 1864 年发生回乱，张氏住户逃往孔昌，直到 1866 年 9 月反乱被左宗棠镇压后，大约到同治末年（1875 年）前后，将庄院及田产交由鹏蕃后裔接续，居住和经营。该庄廓规模较大，东西两院连在一起，庄墙底厚 2 米余，墙顶厚 1 米，墙高约 4 米，墙顶外侧还有高约 1.2 米的梢墙。墙体东西共长 16 丈（53 米），南北宽 8 丈（27 米），面积 1431 平米。院外还有二院和堡壕，与庄院合起来总共面积超过 2000 平米。后来逐渐在院内增建了房屋、窑洞。周边由张氏耕

种的土地最多时共约 800 余亩。是继大岔湾、车家川、小塬子之后，张氏先祖鹏蕃后裔的又一重要居住地。

其后又时逢满清与民国更替之时，社会动荡，匪患依旧接连不断。

民国元年（1912 年）土匪 7~8 人入院从北房等处抢走不少财物。

民国 13 年（1924 年），土匪 5 人入院抢走大批家产。

民国 17 年（1928 年），27 世耀先妻姜要要蒙难。时遇大旱，天灾人祸一齐袭来，农历 8 月 22 日，住在宁夏海原的杨二（王福德的土匪），不但抢走家中财物，赶走骡马 8 匹，更为残忍的是将 27 世先祖耀先之妻姜氏（名要要）用辕马枷板等物拷打，逼要财物，后又投入水窖溺亡，年仅 42 岁。28 世如龄之妻田久生刚生子半年，也因过度惊吓恐惧，不久亡故，不满 30 岁。

窖子遭劫。1931 年（民国 20 年）2 月，住平凉部队杨小猴反叛后扎营郭城驿，带领二百多人行土匪抢掠之事。其年抢走我家牛群、粮食、衣物等。对逃到关家河窖子避难的扯家川、土门峁、小塬子、

大岔湾、关家河等各地的三百余人进行打劫，土匪还试图挖开窖子，但两天无果，窖子中的人非常害怕，后经李世安传话，按照每人一元白洋计算，付给土匪白洋 300 元，我家付了一半。（详见 29 世孙自新专题录音）。另据 29 世自东听老人讲，当时，为躲防匪患，在苦水河边悬崖上修建了窖子，里面大洞套小洞，旁门左道十分复杂。为了活命还得有吃有喝，有空气，防止烟熏火攻等功能，还要有逃生出口等。为防土匪，急人之困，保全村人性命，修窖子时我家出了一半银子。

民国二十几年五月，一个叫赖团的土匪首领带 100 多人，抢走家中七、八头牛和其它财物。

当时匪患之频繁难以说清，以上只是记忆中的一部分，可见民生的艰难。但张氏先祖在屡受磨难的同时，依然凭着自强不息的精神，在顽强的生存与发展。

扯家川上院的修建。民国 5 年（1916 年）在扯家川又建了上院，该院由里外两院组成，里院除四面正房，还建有角房等。外院建有客厅及其他用房。院落大门及房廊台阶皆为三尺左右的长方形石条砌成，主要房屋都是砖木结构，砖墙瓦顶，有木雕、砖雕装饰，雕梁画栋，建筑精美，在当时当地并不多见。

扯家川下院房屋的重建。民国 12 年（1923 年），扯家川下院房屋进行了翻新重建。据自仁讲，所用部分石条和砖瓦，是从大岔湾旧房拆后搬来的（说明大岔湾当时的房屋质量已属上乘）。扯川下院又叫学坊（学府），一方面是为当地办私塾，同时也为家教，28 世弟兄 7 人，读书多少不同，但都是识字人，其中如龄学至“会邑自治讲习所”肄业，元龄兰州中学毕业，虽然当时家中人少地多、劳力紧张，常受土匪抢掠，家境并不宽裕，但依然尽可能让子弟读书，还专门设置学坊，供周边学子学习，可见家人对读书教育的重视。

如龄开办私塾，教书育人。民国三十年前后，28 世如龄在“会邑自治讲习所”肄业后，考秀才未中，先在扯家川张氏家中开办私塾，后又在四方吴家等处教书育人，历时 10 余年，每年来自扯川、关河、朱河、四方等周边各地的学子约有 20 多人，为当地教育发展尽了一份力量。

元龄弃官从教、务农。民国三十几年，元龄从兰州中学毕业后回乡，后来被任用为甘沟驿区区长，因为体恤民情，不行苛政，征粮难以催交齐全，而被上司抓去吊在房梁上拷打，家中只得东凑西借钱粮，替交征粮，将他赎回。后来，有刘世安等举荐元龄

去平凉任职，但他已无心从政，其父耀先也深知元龄心善、软弱，难以应付官场之事，就说别去了吧，还是在家务农看娃娃吧。元龄到此便弃官从教、务农。先后在扯川、关河、朱河等地参与了私塾与村学任教之事。

小塬子堡子的修建。民国 22 年（1933 年），为防匪患，我家又花白银 300 两，在小塬子修筑堡院一座，并将民国 12 年在扯家川下院修建的部分房屋拆搬到小塬子堡院内。该堡子为正方形，每边墙长约 50 米，墙底部厚 4 米，上部厚 2 米，在上部外侧还有高过人头的梢墙（梢墙上有炮眼），三部分总高度约 6 米，四角有堡台，大门顶端留水眼可注水，以防土匪火烧大门。在堡壕上设有木头吊板，可以方便起降，以防匪患。堡内分里院和外院，里院为四合院，外院有窑洞，除磨面窑、看门窑、储粮窑、草料窑外，还有马圈、牛圈、羊圈等，堡子外围有堡壕，堡壕宽约 8 米，深约 4 米，既是筑堡墙时取土的地方，也是堡院的护卫壕，整个堡子的防护功能较为齐全。小塬子的堡子从建成到 20 世纪 60 年代基本废弃，大约只使用了 30 多年，目前仍有遗迹存在。

为了保证修建堡子时的用水，并解决牲畜饮水，在堡子东北侧约 200 米的地方，还修建了一个涝坝（水塘），涝坝形如大锅，顶部边缘周长约 90 米，底部最深处约 5 米，这个涝坝修建的既美观又适用，至今依然存留，多雨年份有雨水时仍可蓄水使用。

另外，在扯家川上院也挖掘有逃土匪时用的地窖子（暗道），从二院马圈里钻进暗道，躬腰行进约 40-50 米就到庄外大园子，园子内有枣树、杏树遮掩，出了园子就可逃到兔儿湾山沟里躲藏。

一方面是屡屡被土匪抢劫，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匪乱，要重建家室、建造防匪设施，家产几近耗竭，还要维持一大家人的生计，虽然土地不少，但生活并不宽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张氏家人依然顽强生存，生生不息。到民国 25 年（1936 年）守先去世之时，家道又逐渐恢复，当时耕地又恢复到 4400 多亩，年收粮食约 50~60 万斤，养羊 4 群约 400 多只，马、骡、牛等 40 余头，糖房、碾房各一处，大马车 2 套从事商运活动，几处有佃户 10 余家，雇工 10 余人，与家人共同耕耘。守先还因为向官府捐献银两和纳粮较多，善待相邻，而被封、被当地尊称为“张老爷”。守先与耀先兄弟时期，虽历经坎坷，但通过

艰辛奋斗，扩建家室，振兴家业，依然成就了张氏历史上的第二个发展高峰。

张氏支援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

1936 年秋天，已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西征到达会宁，迎接二、四方面军，10 月 10 日三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师，会师后为了北上和西征，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还进行了多次交锋，其中当年 10 月 27 日在扯家川对面的慢牛坡，红四方面军 31 军 91 师、93 师就进行了阻击国民党军队的伏击战。

与此同时，群众征集粮草、钱物，支援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的活动同时开展。28 世先辈耀先曾多次说及此事：他说一开始老百姓听说红军来了，人都很害怕，但红军来后，住在场院，不进老百姓的家门，也不打扰老百姓。接触后觉得他们说话讲道理，办事有分寸。后来让他去到郭城驿，给他讲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的道理，还说如果有念过书的童子能参加红军，或捐借粮草钱物支援抗日，都非常欢迎。当他回家后，给家里人讲了红军给他讲的道理。在乡绅王合清、赵喜乾等的协助下，我家筹集布鞋 100 双、银元 200 块、马 1 匹(元龄当甘沟驿区长的骑乘)，还有粮食，捐助给红军。红军还给写了支援抗日费用的条据，并说让保存好条据，后面再来的红军如

见到此条，就不再征收，等革命成功后一定偿还。当时年仅 11 岁的 28 世全龄听了父亲耀先所讲红军的事，心中很羡慕，就与邻居的孩子张福林偷偷跑去找红军，要跟红军去，后来家里有人觉得全龄年纪过小，又把他领回了家。耀先知道后还对家人说，如果我要是年轻，我就跟红军走了。而张福林就跟着红军到了陕北，解放后张福林因残疾（罗锅）复原转业回到会宁县，安排到县人事局当局长，直到离休。张氏家族积极参与支援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的事，29 代和 30 代世孙中有多人都听说过。

如 30 代世孙张雪亮清楚记得爷爷庆龄说过当时我家支援红军的事：红军当年北上，被国民党部队追剿时，曾驻扎在我家粮场休整过，太爷（耀先）曾援助银两，粮食、草料、鞋等财物，红军休整三日离开时留下欠据，并说你们家支援了红军，对抗日有功，请保存好欠据，将来革命成功后一定奉还。红军走后，国民党马家军清剿红军伤员等行动很快到来，为防国民党发现欠据引来横祸，藏来藏去条据就不知去向了。

还有 30 代雪瑞在《家史一隅》一文的“红军情结”一段，回忆她奶奶给她说过的往事：“太爷常说世事变，吩咐儿孙多行善。后有无数兵马现，躲到深山

不敢见。回来见人扫庭院，才知红军是好汉。部队粮场扎营盘，伤员包扎大锅饭。休整三日说再见，红军会师在我县。揣鞋送粮捐银两，欠据丢失难估算。太爷对此很赞叹，谋略筹划向前看。”